

长篇系列年代小说巨著


文方◎著

生在中国

[下卷]

重生时代

奇策铸金版 雄心证宝刀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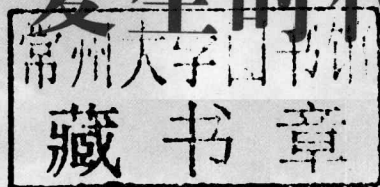
长篇系列年代小说巨著

文方◎著


生在中国

[下卷]

复生时代



奇策镌金版 雄心证宝刀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目 录

下卷 复生时代

(公元 1896 年至 1929 年)

- 第 72 章 白雪红梅的庭园与情人恨别的悲剧 / 1312
- 第 73 章 老大帝国的蹉跎暮色 / 1341
- 第 74 章 楚甸庄园陆崇寿痛兄友逝，金陵古城谭嗣同创测量会 / 1350
- 第 75 章 《疏林送别图》中的陆珊瑚与陈宗权 / 1394
- 第 76 章 惨痛又别金陵 慷慨重起长沙 / 1408
- 第 77 章 戊戌年 / 1424
- 第 78 章 仗义举陆崇寿救石冬 明心事陈宗权重珊瑚 / 1568
- 第 79 章 庚子年与辛丑年 / 1610
- 第 80 章 大劫之后又一年 / 1676
- 第 81 章 求凰格 / 1694
- 第 82 章 振武校陆光熙陈宗权挨揍学陆军 虚霏园陆崇寿曾孟朴悲往忧新政 / 1760
- 第 83 章 萨镇冰领袖海军 陆珊瑚留学日本 / 1831
- 第 84 章 鲜血玉麒麟 / 1854
- 第 85 章 暮天雁断 / 1928
- 第 86 章 曲震《黄龙滚》 / 1950
- 第 87 章 咨议局与“海军大七年计划” / 1985

- 第 88 章 辛亥年 / 2026
- 第 89 章 明月梅花一梦 / 2188
- 第 90 章 陆珊瑚大闹徐公馆 袁世凯呜呼新华宫 / 2299
- 第 91 章 邵蕙波初遇孙立人 陆珊瑚刀劈潘馨航 / 2382
- 第 92 章 国会众议员陆崇寿 / 2459
- 第 93 章 邵蕙波悬崖撒手 / 2518
- 第 94 章 陆珊瑚殉爱牺牲 陈宗权亡命江湖 / 2558
- 第 95 章 陆崇寿之《哀挽录》 / 2586
- 第 96 章 生生不息…… / 2621

下卷

复生时代

第七十二章至九十六章
公元 1896 年至 1929 年

第 72 章

白雪红梅的庭园与情人恨别的悲剧

……坎坷的岁月，艰苦的生活，丰富的见识，传奇的经历，谭嗣同就是这样成长为一位绝代公子的！一位广额丰颐、骨秀神清、长身玉立的绝代公子，一位如炬的目光可以抹杀多少眼前的浮华风头人物、却以温和而悲悯的心灵看所有苦难众生的绝代公子，一位举止豪宕、恢爽诚恳、灵警朴雅、飞扬名俊的神气里带一些狂傲高贵的意味、自有一种上下千古的气概的绝代公子，一位在他的出生之地北京说着漂亮的北京话、在乡愁潜情的纵横天涯之旅说着渗透着湘音的官话的绝代公子！……此时正是星光冷晚、夜色滂浩的时候。在长廊之外的那个背靠大厅的、独立的庭园中，十多株红梅花正在凌寒怒放，年前落下的那场大雪，到此时还未曾融尽，皑皑相衬着那或娇柔秾艳、或豪奢狂冷的花朵与那或横斜纷繁、或疏隔孤峭的枝柯。长廊的檐边疏疏地挂着几盏珠璣彩穗的玻璃灯，灯光似如冰水一般冷冷。林斯槐触目骤感，不由得万思猛涌——冬天是这个庭园最美丽的时候……从何时起，自己的心中深深地铭刻了那个明丽如画、骄傲自信的身影？……陈舜容平静地说道：“别说了。我不是闹脾气。我心里早就知道你今天会跟我说咱们一起私奔的话、早就知道你会来到这里找我……你说，这么多年你一直爱我，那你就该知道，我亲自听你说出了那些真相之后，绝对不会同意和你一起私奔！”……林斯槐叹道：“我以前总不敢相信你会这样心冷意狠，今天，我算是相信了”……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1896年1月20日），大寒节气这一天，林斯槐和陈宗业一起从上海回到了南京。此时，南京城内，人们正为年终诸事而忙



碌着。

这一年仲秋的时候，柯家为了柯景笙与陈舜容的婚礼，又与陈家反复商量了几次，说是柯家老太太有话，她已是活一天算一天、没多少辰光的人了，就盼着快点将柯景笙与陈舜容的婚礼给办了，她从来都觉得只有陈舜容才配得上柯景笙这个她最宠爱的孙子，她能活着看到陈舜容这么个最得人意的孙媳妇嫁到柯家来，就是死了，也能瞑目了。由于柯家催得太厉害，陈家只得同意，在过了年之后，就在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六日（1896年3月19日）那一天，给柯景笙与陈舜容举行婚礼。因此，陈家的人此时除了忙着置备年事之外，也忙着为陈舜容准备婚事。首饰、家具、古董、字画、各色织绣用品……这两年里，在陈舜容的母亲曾丽茗的辛苦筹备之下，陈家给陈舜容将嫁妆中所需的种种物品都快准备全了，唯有新衣裳不能早做，那是从这一年仲秋开始，才命人紧赶着做出来的，到此时为止，还有一小部分没有完工，不过，家中管针线活的女差们和那些新雇的裁缝们都说，他们一定会在年关之前将全部的活计都赶出来，绝对不会误事的。

林斯槐在上海的时候，已经听陈宗业说了陈舜容将与柯景笙举行婚礼的事，可是，在陈宗业的面前，他丝毫不敢将自己那痛苦而焦虑的心情显现出来。回到南京家中之后，在许多场合，有许多人曾当着他的面谈到了柯家与陈家将替柯景笙与陈舜容举行婚礼的事，然而，他只能显得无动于衷地听着那些或者无意、或者有心的谈论。

年关到来之前，林斯槐在反复思考之后，终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向陈舜容彻底表白自己对她的爱情，求她同意与自己一起私奔。

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二日（1896年2月14日）下午，林斯槐的父母带着林斯槐一起去陈家拜年。此时，陈家的东厅内显得很热闹，亲朋好友来得很多。陈家这天准备了好几桌小牌，陈良宰、曾丽茗夫妇请林斯槐的父母也一起打几圈，林斯槐的父母都欣然入座。林斯槐则与陈宗勋、陈宗业等人暂坐在一旁。不管是那些正在打小牌的人、还是那些正坐在一旁闲聊的人，其中的大多数人在谈话时，除了纷纷相互恭贺新禧、感叹去年一年过得实在不容易之外，就是向陈家的人关心地询问有关给陈舜容与柯景笙准备婚礼的事。林斯槐听着人们所谈论的有关那个他所痛恨的婚礼的啰唆话，只觉得烦不胜烦、恨不胜恨，然而，他也只得暂且耐着性子听着。林斯槐本以为能在东厅内看到陈舜容，可是，陈舜容此时却不在这里。林斯槐真想问一声陈舜容在哪里，却恨自己此时实在

不能问、也不敢问。

忽然，只听曾丽茗的一位好友周太太向曾丽茗问道：“大过年的，舜容怎么也不出来看看我这个长辈？难不成如今等着出阁到柯家当孝顺媳妇，不比小时候了，不稀罕我给她的压岁钱了吗？”曾丽茗笑着答道：“你是个忠厚人，怎么年龄老了，嘴倒刻薄起来了！我们舜容怎么会是那样的人？她从昨天晚上起就头疼，直到今天中午还总是发晕，除了略喝些汤水之外，两顿饭都没吃了，因此，我让她就待在自己的屋子里好好歇一歇，等觉得精爽些了，再起来。你一说，倒提醒我了，我一会儿就派人去看看她怎么样了，若可以的话，就让她在吃晚饭的时候过来，得你给的压岁钱。”

林斯槐听到这番话之后，觉得很失望，同时又觉得很忧虑，心想：“她应该知道我现在会在这里的，难道她竟是为了不见我，故意在此时不过来？”

在林斯槐此时的感觉中，东厅中此时的气氛实在热闹得让他再难忍受下去了……于是，他向陈宗勋说道：“陈大哥，咱们还是到书斋去坐吧，那里安静些。”陈宗勋说道：“也好，反正咱们也不打牌，不如到书斋去聊聊。”

陈宗勋、陈宗业兄弟和林斯槐一起离开了东厅，来到了书斋中。书斋的墙壁上，挂着一帧照片，那是陈宗勋、陈宗业、林斯槐、苏望涛、叶维松这五个人在去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春天所照的一张合影。此时，又是新的一年春天的春天了……

林斯槐看着这帧照片，说道：“不知道苏仁原（苏望涛）此时在天津过得怎么样？他对天津中西学堂很好奇，非得去投考不成。可是，那个学堂，‘盛大贪’（盛宣怀）、‘王老年糕’（王文韶）他们是找‘洋鬼子’来掌权的，苏仁原那样的脾气，怎么能受得了？”

——光绪十八年（1892年），“盛大贪”盛宣怀正担任着天津海关道，他与当时正在天津开办中西书院的一个名叫丁家立的美国人商量，准备在天津筹办一所新式学堂，并对于办学章程、专业设置都进行了讨论。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初一日（1895年9月19日），盛宣怀将《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请》呈递给了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王老年糕”王文韶。十一天之后，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1895年9月30日），王文韶将《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西学学堂禀明立案由》这道奏折呈递给光绪皇帝，这道奏折就是从盛宣怀给他的那份禀请摘要改拟而成的。光绪皇帝的办公效率还算高，他在自己看到这份奏折两天之后，于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四日（1895年10月2日），在这道奏折上写下了



朱批“该衙门知道，钦此。”天津中西学堂（北洋西学学堂）随即成立。后来的百多年中，这所学堂先发展为北洋大学堂，又发展为天津大学，这百多年中的沧桑曲折，岂是光绪皇帝在批准成立这所学堂时所能想象得到的……苏望涛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秋天得知天津中西学堂的招生消息之后，经过仔细考虑，决定北上天津，投考这所学堂。他到达天津之后，顺利地考进了这所公费学堂，从此，他在天津这座“北洋之城”开始了一段对于他的一生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的学习生活。光绪二十一年的年底（1896年年初），苏望涛没有赶回南京过年，而是独自留在天津，抓紧时间学习，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没有与母亲陆海棠一起过年。

陈宗勋说道：“苏仁原一直想到北方去历练历练，以他素日的心思和抱负，想来也不只是为了去这么个学堂读书。天津离北京近，他能经常去北京游历一番，多见见识那全国中心的政事民情。”

陈宗业说道：“叶泛然（叶维松）前些天来信，说他这次回天津之后，曾和苏仁原一起去看望了严几道（严复），严几道向他们提起了海军、船政的许多往事。严几道说到光绪初年（19世纪70年代中期）陈季同替苏仁原的父亲苏本严（苏尔宽）在法国购买了许多诸如L' esprit des lois（《法意》）、Discours de la servitude volontaire（《反君主》或《自愿奴性说》）之类的书、并请林镇台（后来担任北洋海军镇远号管带的林泰曾）在回国后交给苏本严的那段往事的时候，显得尤为感慨，连连叹息着说‘二十年啊，就愣是荒废过去了！甲申之战，苏本严那些人被弄到绝境中惨死，十年之后，甲午之战，林镇台那些人又被弄到绝境中惨死，如今，倒是陈季同和我这样的人还依然活着、依然无补于世，真是惭愧！’”

——严复（几道）与苏尔宽曾同在福州船政学堂读书，严复所学的是驾驶专业，苏尔宽所学的是制造专业，当时，严复所用的名字还是严宗光。严复于同治十年（1871年）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之后，他曾在建威号、扬武号军舰上实习、工作了五年。光绪三年（1877年），严复作为清朝廷所派遣的第一届海军留学生之一，与刘步蟾、林泰曾、叶祖珪、萨镇冰等其他十一人一起，赴英国深造驾驶专业。在英国留学期间，严复先在抱士穆德学习肄业，又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当时，刘步蟾等人将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在英国军舰上实习，而严复则没到英国军舰上实习过，他虽然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高等数学、化学、物理、海军战术、海战公法以及枪炮营垒

等诸多课程，可是，他的抱负并不仅仅限于成为一名“海军良将”，因此，他将自己那宝贵的留学时间匀出了一大部分，观察英国社会，了解英国的法制和立宪政治，阅读并研究那些著名的欧洲资产阶级学者例如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穆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著作。光绪五年（1879年）夏天，严复结束了留学生活，回到中国，在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充任教习。光绪六年（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天津水师学堂，将当时年仅二十六岁、官阶仅为武职都司的严复调到天津，担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其实，严复所承担的却是总办（校长）的责任。九年之后，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时候，严复连捐带保，给自己弄到一个“选用知府”的官衔，这样，他才获得了足够的官场资格、被升任为天津水师学堂会办（副校长）。又过了一年，光绪十六年（1890年），已经三十六岁的严复总算被正式任命为天津水师学堂总办（校长），而这时，他已经实际承担总办的责任十年了！光绪十八年（1892年），三十八岁的严复在耗费了巨大心力之后，让自己的官衔被擢升到了“选用道员”，让自己获得了能与北京、天津一带的高层官僚相周旋的官场地位，从此，严复的言论总算是能稍微传一些到某些高层官僚那似聋非聋的耳朵里了。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这一年，严复已经四十二岁了，他的许多同学已经死了，而他自己也被耽误了许多年的宝贵时间，无法真正发挥他的惊人才华！

林斯槐叹道：“严几道去年遇到的麻烦也够多的了。他那几篇痛快淋漓的政论——《救亡决论》、《原强》、《辟韩》、《原强续编》发表之后，连张之洞这个享有‘开明’声誉的老狐狸都对他的那些言论痛恨不已，就别提其他那些老不死的了！他去年一年新结的仇人，比他此前四十年所结的全部仇人还要多出数倍，弄得他险些连那区区的天津水师学堂总办都当不成了。”

陈宗勋冷笑道：“严几道的新仇人想将他除掉、整死，他那些旧仇人更是找到机会就折腾一阵。威海之战结束之前，北京的官僚们得不到被困的北洋海军的确切消息，却纷纷奏请将北洋海军的官员们严惩，以显示他们这些待在北京看热闹的官僚是如何的“主战”。别的也不必多赘，只说那个曾教过当今皇上的宠妾珍妃读过几天书、自命为‘帝党中坚’的文廷式，他说丁汝昌‘天神共愤’，说刘步蟾‘巧言谄媚、行为卑鄙、加之怯懦、素无一战之绩’，又特别不忘了将严几道也给捎带上，说什么‘严复性尤狡猾，主持闽党，煽惑人心，似应从重查办。’咳，依我看，严几道的那些所谓新仇人，有许多也不过是以前将仇恨暗藏在心里的旧仇人而已！”



陈宗业也叹道：“严几道这些年过得真够离奇、真够辛苦的。他这样一位博涉群书、学贯中西、有实际办事才能、也有多年办事经验的海军留学生，为了让自己能被当今的许多愚人蠢材看得起，非得折磨自己、非得让自己也将科举之路走一走不可！他居然不惜浪费那么多的银子给自己捐了个监生资格，再白白地搭上那么多的工夫、那么大的力气，去参加乡试，他本来想得挺好，以为自己会很顺利地通过乡试，当上个‘举人老爷’，接着，就是会试、殿试、朝考连战连捷，贡士、进士、翰林连跳连升，直至进位公卿、赞襄朝政大事。可是，仅仅一个乡试，他居然就考了四次——光绪十一年（1885年）到福建参加乡试一次、光绪十四年、十五年（1888年、1889年）参加北京的顺天乡试两次，光绪十九年（1893年）又到福建参加乡试一次，哪次他都没通过！若不是甲午开战之后，他想通了，决定不再走科举之路了，真不知他为了那个‘举人老爷’的头衔，还得再受乡试的多少次折磨！”

林斯槐苦笑了两声，说道：“范进尚且能够中举，严几道有这样的才学，又有吴挚甫（吴汝纶）这样的名师指导，他的八股文居然还写得不入那些乡试考官的法眼！天啊，咱们中国的科举考试究竟是什么考试啊，怎么这样难考啊！”

——吴汝纶（挚甫）生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他是同治四年（1865年）乙丑科进士，也是晚清最负盛名的桐城派文学家之一。他青年时代就以文章而显名于世，因为他与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这三人均以师礼尊曾国藩、且均以文名而为时人所称道，所以他们四人被并称为“曾门四弟子”。他曾留佐于曾国藩幕府，在调直隶之后，又参李鸿章幕府，当时所谓“中外大政常决于曾国藩、李鸿章二人，其奏疏多出于吴汝纶之手”。在当时的旧派文人中，他算是一位略有些新思想的人物。他是严复的八股文老师，也非常赏识严复在西洋学问上的非凡造诣。

陈宗勋哈哈大笑了几声，说道：“咱们中国的科举考试，在地球各国中，是独一无二的厉害考试，当然难考！何止一个严几道对付不过去！左文襄（左宗棠）倒是中举了呢，可是，他在科场上的运气终究还是不如范进。那范进中举之后，虽然因为他老娘乐得痰迷心窍、一命归西而害得他在家丁忧三年，误了一科的会试，可是，他丁忧之后，一重返科场，就会试、殿试连考连捷，轻松自在中了进士。那左文襄自从二十岁那年中举之后，可是考了三次会试都没考中。”

陈宗业听了林斯槐和陈宗勋的话之后，不由得又笑又叹，于是，他也说道：

“范进中举颇难，难道他进学就很容易吗？范进可是足足五十四岁了，才进了学、当上秀才的！咳，如此说来，彭刚直（彭玉麟）虽然直到三十四岁还只不过是附生，可是，跟范进相比，他还算是发达得很早的了！”

林斯槐痛笑一阵，忽又冷冷而叹：“严几道赴南北乡试四次，不得中举。谭复生（谭嗣同）比严几道受的折磨更多！他从少年至如今，已经赴南北乡试六次了，偏偏屡考不中！”

——谭嗣同，祖籍湖南浏阳，同治四年（1865年）生于北京，这一年三十一岁。他出身于浏阳的大绅士家庭，他的父亲是时任湖北巡抚的谭继洵。他五岁时在北京开始读书，他的童年、少年时代主要是在北京度过的。光绪四年（1878年）、他十三岁那年，他的父亲谭继洵到甘肃做官，因此，他跟随他的父亲来到了甘肃，此后几年之内，他在中国的西北和两湖地区数次往返。光绪十年（1884年），他十九岁，这一年，新疆建省，湘军名将、曾跟随左宗棠收复了新疆的刘锦棠成为了首任新疆巡抚，于是，他从军新疆，成为刘锦棠幕府的一员。自此十年之内，他来往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广泛而深刻地了解研究了中国的国势民情。谭嗣同辞章非凡，自成一格，任侠好武，倜傥有大志，富于维新思想，是当时中国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陈宗勋长叹一声，说道：“谭复生考了六次乡试，都是他父亲勒令他去考的，岂是他自己愿意去受那些折磨！他为文奇肆，鄙视科举，讲求经世致用之学，他就是写八股时文，也难以拘束住自己的本来气概，他要是能像范进似的考中个举人，那才奇怪！”

——有些人将谭嗣同与陈三立（时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的儿子）、吴葆初（曾任浙江提督的淮军将领吴长庆的儿子）、丁惠康（曾任船政大臣与福建巡抚等要职、绰号“丁鬼奴”的丁日昌的儿子）并称为“四公子”，因为他们觉得这四人都是这个时代的高官之子，而且都以辞章为人所称。可是，谭嗣同这个公子可不是很多人所想象的公子，他在现实的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痛苦，实在难以尽述！谭嗣同是谭继洵的第三个儿子，他的母亲徐五缘是谭继洵的原配夫人。谭继洵有一个妾卢氏，卢氏很为他所宠。在谭继洵的纵容之下，卢氏不仅与徐五缘不停地争闹，将一个家搅得天翻地覆，而且想尽了办法陷害、折磨、虐待徐五缘的孩子。谭嗣同同胞兄弟三人，大哥谭嗣贻，二哥谭嗣襄。谭嗣同六岁的时候，他的大哥谭嗣贻已经十九岁了，这一年，徐五缘送谭嗣贻回家乡



湖南浏阳结婚，谭嗣同则仍然留在北京的家中读书。徐五缘离开北京的那一段时间里，卢氏对谭嗣同这个六岁的小孩变本加厉地加以折磨和虐待，而谭继洵居然就任其如此对待自己的儿子！谭嗣同那时年龄太小，难以有效地反抗那些折磨和虐待，竟然因此而忧郁成病，整天沉默不语，惟借读书苦度时光。第二年，徐五缘从浏阳回到了北京，看到谭嗣同竟然被弄成这副样子，知道一定是谭继洵和卢氏待他很坏所致，不禁气得反复询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而心气高傲、性格倔强的谭嗣同就是什么也不说，徐五缘无奈，也只得不再问了，唯有自己叹息不止，她在恨谭继洵和卢氏的所作所为的同时，也为谭嗣同的倔强而悲喜不已：“这孩子这样倔强，就是我忽然死了，不能照顾他，他将来也一定能自立、能成大器。可是，想想他落到那两个没人心的东西手里之后会受些什么折磨和虐待，我怎么能不气、怎么能不恨！”光绪二年（1876年），谭嗣同十一岁那一年，徐五缘因患白喉而去世，谭继洵家从此就“小老婆当家”，卢氏不仅随意让谭嗣同在生活待遇上受到种种苛酷的折磨，而且还凭借“庶母”的名义任意打骂谭嗣同。徐五缘活着的时候，谭继洵为了宠卢氏，尚且对徐五缘所生的谭嗣同很是嫌恶，徐五缘病逝之后，他更是只听卢氏在他面前所说的关于谭嗣同的种种坏话，对于谭嗣同时时进行毫无道理的严厉责难和苛刻约束。谭继洵和卢氏恨不得将谭嗣同早些“管死”，可是谭嗣同岂是他们能“管死”的！俗语所谓“英才天纵”，说谭嗣同真是再合适不过！谭嗣同少年时的家庭环境虽然这样恶劣，可是由于他自尊自强，他一直保持着良好的道德修养，他的智慧学识也日日增长。最可称奇的，就是他因为自幼就具有敢于叛逆的倔强性格和以抑强扶弱为己任的任侠思想，所以，在北京城这个各类人才荟萃的大都市中，他结交了绰号“大刀王五”的王正谊（王五）这样一位堪称人杰与义侠的人物，向王五学习剑术和刀术。王五是个回教徒，他像谭嗣同一样，具有英武、慷慨、倔强的性格和对于恶势力桀骜不驯、敢于反抗的精神，他与谭嗣同有着深厚的友谊，彼此以兄弟相称。谭嗣同随着自己的阅历越多、年龄越大，对于封建礼教就越来越鄙视、越来越叛逆，他父亲谭继洵看他如此，觉得他简直就是个敢于弑君弑父、敢于谋反犯上的叛贼逆子，因此就更加心安理得地觉得自己厌恶他、苛责他是很符合圣人们的教训的，就更加无休无止地厌恶他、苛责他，并自称这是为了让他知道走正路、免得他将来给谭家惹来抄家灭门的大祸！并列为“战国四公子”的齐国孟尝君田文、楚国春申君黄歇、赵国平原君赵胜、魏国信陵君魏无忌，个个都是奢侈浪费、挥金如土之徒，个个都以招致宾客著称

于世。可是，谭嗣同这个名在“晚清四公子”之列的公子，虽然生在一个富贵双全的大家庭中，可是却被迫处于一点儿做不得主、虽然有钱又不由他使的窘境之中。谭嗣同有一个湖南浏阳同乡名叫唐才常，此人年少谭嗣同两岁，天赋很高、富于学识、抱负不凡，是谭嗣同最好的朋友。唐才常的家境很贫困，因此，他承受着沉重的家庭经济负担，他从二十岁起，就开始了教书生涯，或是在绅士家担任家庭教师、或是在书院中代课、或是在官衙门中担任阅卷并教读，所得的微薄报酬，一部分他留给自己当生活费，一部分他寄回家中补贴家用、减轻他父亲的负担。光绪十九年（1893年）秋天，二十六岁的唐才常应湖南乡试落第，一时又找不到工作，不得已只能给当时远在湖北武昌、正居住在湖北巡抚衙门中读书的谭嗣同写信，将自己的困难处境告诉了他，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谭嗣同接到唐才常的信之后，当然自觉义不容辞，一片诚心地想帮助唐才常，无奈他手中实在没有什么钱，而谭家的经济大权又被他的父亲和他的庶母死死地掌握着，他根本不可能向他们借出一笔钱来帮助唐才常，于是，他费了好大的力气，从自己的一些亲戚、朋友、熟人那里七扯八挪地借来了一些钱，又将自己手中仅有的一些余钱凑了上去，才算凑出了可以帮助唐才常度过眼前难关所必需的一笔款项。就靠着这笔钱，谭嗣同给唐才常筹出了来武昌的旅费和帮助唐家摆脱困境的急需费用。唐才常来到武昌之后，谭嗣同请他在湖北巡抚衙门内住下，又帮他找到了一个工作。后来，谭嗣同听说两湖书院课额尚有五名，就让唐才常去报考，唐才常幸而考取了，从此，生活才相对安稳下来。谭嗣同游历南北、结交江湖豪杰之举，总需要有一定的经济支持，可是，由于他父亲谭继洵素来都对他的这些举动深恶痛绝，认为他那是纯属胡闹、不过惹事招灾而已，因此，在钱财上对他总是克啬异常。可叹谭家那么富贵，有意或无意浪费的钱财不知道有多少，偏偏就让谭嗣同虽有四方之志，却终不得而尽！珠履银铎、千金一掷式的公子生活，在别的公子也许是很平常的，可是，谭嗣同这位名列“晚清四公子”之一的著名公子何曾经过一天这样的公子生活！然而，他曾在中国西北地区那挟裹着尖利的沙石、扑打削割着人面的狂风中骑着烈马奔向狰狞恐怖的山谷寻奇探险，曾在那被豪跃的猎火照耀得似乎都快燃着的夜空之下逐杀于褐隼苍狼之群，曾在沙漠毡庐之中痛饮过拌着雪的黄羊之血，曾在那古老的新疆木卡姆音乐的伴奏之下尽情舞剑高歌，曾聆听过横掠过千里黄云、万丈白日、纷纷雪幕、漠漠冰瀚的雁阵的哀鸣，曾饱看过台湾澎湖那被沧海浩波洗练而出的微茫月光、洪荒古树、千家番社、万灶炊烟……坎坷的岁



月，艰苦的生活，丰富的见识，传奇的经历，谭嗣同就是这样成长为一位绝代公子的！一位广额丰颐、骨秀神清、长身玉立的绝代公子，一位如炬的目光可以抹杀多少眼前的浮华风头人物、却以温和而悲悯的心灵看所有苦难众生的绝代公子，一位举止豪宕、恍爽诚恳、灵警朴雅、飞扬名俊的神气里带一些狂傲高贵的意味、自有一种上下千古的气概的绝代公子，一位在他的出生之地北京说着漂亮的北京话、在乡愁潜悄的纵横天涯之旅说着渗透着湘音的官话的绝代公子！……

林斯槐、陈宗勋、陈宗业三人将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浏阳筹办算学格致馆却因受到种种阻碍而不得不暂告停顿之事谈论了一阵、慨叹了一阵之后，又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组织的强学会因为御史杨崇伊的弹劾而被慈禧太后下令封禁一事谈论了一番。

“李鸿章曾想参加强学会、并说愿意捐三千两银子给强学会当会费，可是翁同龢的亲信、户部郎中兼军机处章京陈炽倡议说，强学会是讲中国自强之学的，可是李鸿章是签订《马关条约》的罪魁祸首，他与中国自强之学有什么相干？若让李鸿章也加入强学会，只能让他那万世洗不完的臭名声玷辱了强学会！强学会如今在朝廷上有翁师傅（翁同龢）照应，在地方督抚中有张制台（张之洞）、刘制台（刘坤一）、王制台（王文韶）支持，在军队里有宋军门（宋庆）、聂军门（聂士成）拥护，难道还会缺银子用不成？哼，李鸿章拿出这区区的三千两银子算得了什么，就是他拿出三万两银子来，强学会也用不着稀罕！绝对不能让李鸿章也参加强学会。李鸿章被拒绝之后，自然非常恼怒，于是，他就指使杨崇伊上疏弹劾强学会，说强学会‘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慈禧那老妖妇是最怕这些话的，于是，她看到杨崇伊的奏疏之后，赶快就下令将强学会给封禁了。”陈宗业说道。

——杨崇伊是江苏常熟人，他的长子名叫杨圻（云史）。李鸿章的那个过继儿子李经方有一个女儿，名叫李国秀。光绪十八年（1892年），十七岁的杨圻娶李国秀为妻。因此，常熟杨家与合肥李家攀成姻亲，杨崇伊与李经方成为了儿女亲家，李鸿章成为了杨崇伊的老姻长。杨圻有“少年名士”之称，善于写诗。时人纷纷叹息说：李鸿章的女儿李菊耦空有那样好的容貌才识，却在二十二岁的韶华之年嫁给了张佩纶那么个比她大十八岁的“战败罪人”当第二次续弦的老婆，真是够惨的。李国秀与杨圻，这两人至少年龄还相当……咳，且不说别的，反正，各人有各人的命运，只看李国秀将来比她姑姑李菊耦又如何了……

林斯槐听了陈宗业的话之后，不禁说道：“强学会有那么一大堆要人支持，怎么就那么禁不住事？只凭李鸿章那老东西指使杨崇伊那小崽子一弹劾，说封禁就封禁了？”

陈宗勋冷笑道：“杨崇伊的奏疏上说的狠话多着呢，岂止‘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诸如‘走门贩卖西学书籍，并抄发各馆新闻报，刊印《中外纪闻》，按户销售。犹复借口公费，函索外省大员，以毁誉为要挟。’之类，都是杨崇伊给强学会搜罗出来的罪状。不过，强学会内部闹得也太厉害、太不堪了，前前后后加起来也没有几个月，他们内部各个派系的人闹出多少纷争来！‘清流老师’李鸿藻的亲信张孝谦在翰林院当编修当得都快穷疯了，整天想的无非就是如何用铜臭一罩墨臭。强学会那许多用大捧银子捐助来的会费，张孝谦那厮岂有不大打主意之理？张孝谦在强学会中主事之后，就吵吵说‘筹款一切都靠我出力，强学会就是我张某人的强学会。’丁立钧也是翰林院编修，与张孝谦是同僚，因为张之洞那老猢猻很赏识他，所以，张孝谦对他很是排挤。陈炽是翁同龢的亲信，张孝谦、丁立钧这二人与他的矛盾都很凶，因此，当张孝谦与陈炽大闹了一场之后，丁立钧想趁机将陈炽彻底打垮，就跳出来说他愿意给张、陈二人‘调停’一下，结果，经过那次‘调停’之后，张孝谦和丁立钧成了一派，联合起来在强学会中挑剔生事，打压康有为、梁启超、翁同龢的那些门徒们……反正，谁与他们此时不是一派，他们就打压谁！说到底，强学会内部闹来闹去，争的就是该怎么用那些会费。康有为、梁启超、陈炽他们想发行报刊，宣传守旧不变的危险，可是，发行报刊所获的利润是非常微薄的，动不动还得‘免费赠阅’、或者自己出钱委托出售官报的人将强学会所出的报刊搭送到各个官宅。张孝谦、丁立钧就想在琉璃厂开个能牟利的书店，至于书店的经营与强学会那‘讲中国自强之学’的立会宗旨有多大联系，他们倒不在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想借强学会广联人才、促进维新、以图大事，张孝谦、丁立钧则忙不迭地将他们用得着的私人拉进强学会中，给他们自己装门面。……强学会岂能禁得起这样没完没了的大闹，杨崇伊上疏弹劾之前，强学会就已经被闹得快散了架了！”

听着陈宗勋的这番话，林斯槐与陈宗业都连连叹息不已、连连冷笑不已。陈宗业又补充说道：“强学会看着挺厉害，有那么多要人又入会、又仗腰子的，其实，那些要人都不过是装着玩儿的，稍有个风吹草动，他们一个个将脖子都缩得快着呢！杨崇伊是在去年腊月初六日（1896年1月20日）正式上疏弹劾



强学会的，那天中午，张孝谦从军机处得到消息之后，气急败坏地跑到强学会的会址所在北京宣武门外后孙公园，通知会员赶快搬迁，然后，他就离开了，连滚带爬地跑到李鸿章那老东西那里去讨好求情——那时，他的靠山‘清流老师’李鸿藻恰巧在南方出公差、不在北京，李鸿藻的势力，他是一点也指望不上了，哼，他自己也很清楚，李鸿藻那时就是在北京的话，也绝不会在这种形势之下出头管强学会的麻烦、触慈禧那老妖妇的霉头的，他还是只能自己连滚带爬地去找李鸿章那老东西告饶！强学会的其他那些会员们——刑部郎中沈曾植还算镇静，忙着去找人疏通，力图挽救危局。丁立钧就知道忙着将强学会从同文馆借来的书籍、仪器缴还回去。内阁中书熊余波只会在地一边打转、一边唠叨说，他想到杨崇伊家看看，也许杨崇伊并不想将事情闹大了。至于褚成博、张仲忻这两位御史，还有其他一些人会官员，都唯恐受到连累、将官职丢了，就纷纷匿迹不出。陈炽去找他的靠山翁同龢求救，翁同龢不紧不慢地对他说，就快到腊八了，正巧你提前来了，那我就提前请你在我家喝一碗腊八粥吧，陈炽急得将求救的话颠三倒四地说了又说，可是翁同龢就是不说一句他愿意出面搭救的话，只是含糊其辞地告诉陈炽说，还是到与此事有直接关系的衙门去想想办法；最后，陈炽只得一边掉眼泪，一边将翁同龢命人端到他面前的那一大碗滚烫的腊八粥匆匆忙忙地喝了几口下去，然后，他就讪讪地起身告辞；他一走出翁府的高门槛，就疯了似的大哭起来，跟他一起来的随从连忙将他扶上了他那辆大鞍车，他坐在车上，直着脖子哭了一路，那哭声特别响，根本不是大鞍车的颠簸轰隆声、马蹄的奔驰蹂躏声所能掩盖得住的。到了腊月初九日（1896年1月23日），京城北门贴出了告示，说是要抓强学会的人，更闹得人心惶惶。陈炽自打从翁府回去之后，白天灌着酒、就是不愿醒，晚上看着灯、就是不敢睡，已经若痴若狂、连唱带哭地折腾了三天了，他听到要抓人的消息之后，先被吓得安静了一会儿，然后，他就接着折腾，并且折腾得更厉害了。丁立钧也被要抓人的消息吓破了胆，低着头、捂着脸、眼泪鼻涕顺着手指缝不停地往下流，呜呜咽咽地将‘人心已涣，事无可为。’这句话连着念叨了一、两个时辰之久。那时候，张之洞、王文韶、刘坤一这些掌握着地方实权的封疆大吏和聂士成这些掌握着军队实权的武将都已将强学会遇到的麻烦知道得很详细、很清楚了，可是，他们就是不肯出头管一管。梁启超气得要死，只得公开放出话来说，如果那些参加了强学会的权贵再不出来设法挽救，听任强学会覆灭，那他和汪大燮这两个《中外纪闻》的主笔就要写信上告，将那些权贵的所作所